

中国近代思想与
学术的系谱

〔增订版〕

王汎森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近代思想与
学术的系谱

〔增订版〕

王汎森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王汎森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
ISBN 978-7-5426-6108-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5188号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王汎森 著

责任编辑/黄 韬

特约编辑/黄旭东

装帧设计/马志方

内文制作/龚碧函 李丹华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57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965mm×635mm 1/16

字 数/500千字

印 张/37

书 号/ISBN 978-7-5426-6108-1

定 价/9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自序

本书探讨道光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约一百年间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写一部通论近代思想、学术的书，而只是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一些研究。我个人认为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在经学上，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认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康有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层（傅斯年）；在道德上，发现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关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关于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启超）；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刘师培），国其实不成其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对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则发现中国没有“社会”，也有人认为过去两千年的治政理论都是“在空架之上层层描摹”（毛泽东）。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但至少在思想上或理念的层次上这是一个断裂和跳跃。同时，这些新思想新概

念，也回过头来极深刻地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收在这里的文章并不是有系统地写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两种限制。首先，因为机缘不同，所以文章有详略之异。其次，正因为这些文章是随着不同的需要而写成的，所以并没有预想一个系统。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条线索。第一部分：“旧典范的危机”，从晚清内部思潮的变动开始。方东树的例子，是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在晚清思想史中的意义。方氏此举，显然并不只是理学的回潮，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的动向。有关邵懿辰的文章，则是探讨邵氏的一本小书，如何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后来逐步扩大，成为近代庞大的疑古运动的一个根源。邵氏的一些论点，代表了在时代的催化之下，传统内部的思想因子产生的蜕变。太谷学派的出现，则代表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因应时代困局的一次并没有成功的努力。这三篇文字，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一文则在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版的历史记忆，而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种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别谈清季上层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四种变化，它们设定了一个背景，并作为以后诸篇文字发展的张本。

第二部分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其中的《从传统到反传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篇，都是提纲式的文字；《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尽管是针对特定的现象而写，但也可以看作是从特定的角度谈从传统到现代曲折而蜿蜒的发展路径。“传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风貌。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想了解传统与每一个时代的关系，必须将那个时代主动的诠释与使用考虑进去，而不应局限于线性的因果关系。

传统与现代复杂的纠缠，也表现在私人领域上。近代中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无所不在的国家化、政治化，公领域如此，思想、学术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倾向，而以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为其高峰。本书收了一篇《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便是有关这个现象的举例性探讨。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思想资源”的重大变化。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来说明：“思想资源”之转移以及“概念工具”的变动，如何改变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讨论了当时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绝不是想通盘讨论所有相关的细节，而只是想借此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之变化，对当时思想界的变迁就难以理解了。

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作为思考自己处境及命运的工具。在 William H. Sewell 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劳工问题的书中，作者发现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用来思考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境况的方式产生了改变。在工厂中过着艰苦生活的人，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用许许多多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处境，但是有了“阶级”的概念时，便可能赋予当前处境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语言与概念非但表达了社会的现实，它也“建构”了社会事实。在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先是使用一群旧概念去诠释新东西，但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慢慢地涌入，并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大约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概念逐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胡适说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名词运动，并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些抽象的未经界定的文辞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别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实即说明了新名词、新概念建构现实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一文，说明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又何以能够逼使这类思想更易于为人接受。同时，从刘师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两难，

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方面又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挣扎于一个艰苦时代的痕迹。

第三部分是“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1905年废除科举，千年以来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统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旧士人走投无路，一批文化精英由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做官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顾颉刚）。读者会发现这一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关。傅斯年当然不是“建立学术社会”的唯一代表，但他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灵魂人物，而我个人恰好对他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写了几篇和他有关的文章。在这一组文章中，《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是姊妹篇，它们都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我希望用它们作例子来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形成的历程。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许许多多这种新诠释典范出现。此外，这两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现代思想中讲求多元、强调变化的观念如何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则以身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傅斯年为例，说明他成学的经过、他的志业以及当时学术界“新”、“旧”、“公”、“私”之间的纠缠与冲突。《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则以一件个案来说明学术上从旧到新的转变，以及牵涉其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间接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上的努力。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则指出近代中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要学术独立，免于政治及道德教条之干扰；一种是愈来愈强的“主义崇拜”，希望以“主义”来指导一切。这两股力量的冲突表现在许多事物中，本文则是以陈寅恪为例，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仕分途以后，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

同时，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始终不曾

消失的紧张性。道咸以来，传统学术极力挣扎着改变自己，以求扣联政治、社会，而在民国新学术运动开展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术的社会性与平民性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想步趋西学，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新学术，同时也希望“为学术而学术”，将政治与道德教条对学问的干扰减到最低。但人们很快发现：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现实致用之间的紧张，及学术社群的自我异化的问题。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彻底“对象化”、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之后，也使许多学者产生了生命意义的危机感。

在编辑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曾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删改；为了使眉目更为清楚，几篇文章的名字也作了更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原题《方东树与晚清学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原题《邵懿辰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陆杂志》90卷3期）。《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原题《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研究的回顾》（《新史学》五卷四期）。《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原题《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孙敦恒等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原题《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45期）。《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原题《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大陆杂志》90卷6期）。《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原题《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116期）。《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原题《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原题《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当代》123期）。此外，我也对几篇文章的副标题作了增删。《从传统到反传统》一文发表在《当代》一个讨论反传统思想的专辑（《当代》13期），其中也采撷了我的《古

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录。《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思与言》34卷3期)有一姊妹篇《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发表在《当代》91期(1993)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有关太谷学派的一文,发表于1994年,当时并未能直接读到太谷学派的经典,而是以回顾二手研究的方式写成,所以径注页码于文中。该文主要是想探讨它在晚清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我个人得以见到大量太谷学派的遗经是晚近的事。

此书编校的过程迁延至三四年,拖了这么多年才完成,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将这些文章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与出版公司签订了一张契约,言明要编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论文集,但这件事一再延搁,始终不曾付诸行动。如果没有陈平原兄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向我苦苦催逼(按:本书有一个所收文章较少的简体字版在该社出版),我大概是无法辑成这本小书的。本书的台湾联经版原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同时进行,但因为增补了一些新文章,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稽延至今,应该在此郑重说明。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友刘季伦先生,他对本书的编辑过程费过很大的心血,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此次修订,曾参考汪荣祖先生书评之意见,特此致谢。林志宏学弟及家弟王昱峰等人费心校对本书,我要在此特别谢谢他们。初编此书时,我个人适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感谢那里的朋友们。

新旧篇名对照表

原 篇 名	本书篇名
方东树与晚清学风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邵懿辰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古学派研究的回顾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
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读“傅斯年档案”札记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

目 录

引 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 001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 017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

——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 038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 / 055

汪梅翁与《乙丙日记》

——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 / 077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以章太炎为例 / 112

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从传统到反传统

——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 129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 152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 181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 203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 217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

——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 244

思潮与社会条件

——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 264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 300

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

——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 331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 349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 372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 408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

——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 497

附 录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

——读“傅斯年档案” / 527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 556

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

——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 565

索 引 / 573

引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¹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李济语）！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国科会”人文处历史学门通过计划的名单是观察台湾史学趋势的一项好材料。从近年来所通过的专题计划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台湾史学界对种种西方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有几个。第一是认识到文化的建构力量之强大，从而对各种界域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或是对过去被视为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是各种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出版史、生态史、情欲史、阅读史等）。第三是与性别、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国族主义有关的研究。

没有人能否认以上种种新发展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我在

1 本文在2003年3月蒋经国基金会于普林斯顿召开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新视野”的会议中发表，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

此不想重复这些新动向。此处所谈的，纯粹是我个人实际进行研究工作时的一些反思。

近一二十年来，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历史眼光的改变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地，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大量问世。在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 document）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日记被整理出版，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胡适的日记》¹、王闾运的《湘绮楼日记》²、刘大鹏（1857—1942）的《退想斋日记》³、《吴宓日记》⁴、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⁵、朱峙三的《朱峙三日记》⁶、陈范予（1901—1941）的《陈范予日记》⁷、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⁸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书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⁹、《罗振玉王

1 胡适：《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共18册。

2 王闾运：《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共5册。

3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共10册。

5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共10册。

6 《朱峙三日记》刊于《辛亥革命史丛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223—337。

7 陈范予著，阪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8 缪荃孙著，李一华等编：《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共10册。

9 耿志云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共42册。